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风险社会的价值批判

雷云飞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对风险社会的反思批判开启了深刻认知风险社会的价值维度。通过对科技理性的反思批判,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虚伪实质,从而阐释了唤醒人的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并为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并关注人的主体价值,需秉持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思想,为科学认知和治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以实现人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风险社会;科技理性;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7)02-0009-07

收稿日期:2016-1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研究”(14BZX018);西安理工大学资助项目“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哲学反思”(110-211301)

作者简介:雷云飞(1981—),男,陕西岐山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风险社会就是指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社会不仅逐步进入了由科技理性主宰的世界历史,还在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风险的同时,对人类自身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反思的社会发展阶段。它的形成与工业文明的兴起并行不悖,在某种程度上,工业文明的诸多弊端实质上就是风险社会的主要内容,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对人的发展状况的价值反思,为我们正确认知风险社会的实质内容提供了思想指导、审视眼光和价值参照。那么,重新剖析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的思想以及关怀人性的基本观点,就成为深刻反思和认知风险社会这一论域不可或缺的研究任务,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薪火相传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

一、对风险社会中科技理性之维的价值批判

如果说风险社会的产生是科技理性的急剧膨胀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并进一步导致人与社会及人与人自身之间危机日益加剧的结果,那么,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及科技理性的深入批判和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在某种程

度上就是另辟蹊径地对风险社会理论的阐释和解读。

(一)霍克海默对启蒙理性精神的批判,为科学认知和反思风险社会正本清源

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四伏的风险都是启蒙精神高度张扬的现实表征和工具理性片面膨胀的恶果,所以,就从工具理性的批判开始着手打开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线。

一方面,对启蒙的批判不仅是对人本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扬,而且还是对科技理性恶性膨胀的揭露。叔本华、尼采的人本主义哲学不仅掀起了哲学史上的人本主义思潮,还以此为分水岭而宣告“上帝死了”并要“重估一切价值”的基本理念,从而试图打破科技理性一统天下的哲学话语,且将人的主体性因素拉入哲学思考范畴,这就在科技理性的集权主义铁环上打开了一个将其统治地位最终颠覆的缺口,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做了出场学意义上的理论铺垫。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的本初目的在于让人们科学运用理性摆脱人类在中世纪被奴役的状态,让人们在理性的辅助下改造自然、改造

社会,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的健康进步。启蒙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确实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但是与此同时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创造”了许多让人难以克服的难题,譬如土地沙化、河流干涸、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核污染等,这些现象就迫使人们重新反思科技,这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风险社会理论的正式形成。霍克海默也正是鉴于此才开始了对启蒙的批判,面对这些充满高度风险的社会现象,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理性的胜利而招致的困惑之中。启蒙是从中世纪的崇尚超自然力量绝对统治的神话发起,但同时却又使理性本身成为绝对统治力量的神话。在通往现代理性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以往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从而用公式替代了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了原因和动机,所剩下的原因则只简单地变成衡量科学批判的最后一个哲学概念,成为一个为了能够继续进行科学批判而供人随意摆弄的玩偶。这就是说,在理性的引领下,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运算并得到合理的解决,启蒙的历史作用在理性的统治下达到极致并将神话取而代之,关于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风靡。

另一方面,批判实证主义,揭露科技理性新形态的实质。霍克海默认为推动工业文明的进步是科技理性之社会功能的一个方面,此外它还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人本身的物化,这就让资本主义的统治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究其原因,实证主义思想虽然“功不可没”,但“最终没有给思想自身留有任何余地,消除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主体在取消意识之后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以及一切意义,因为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及启德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1]这就说明了实证主义的理论实质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是维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理论支柱并且与现实社会互相维护、相互印证。于是,人们的生活在愈来愈安逸的时候,不仅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风险,即使人本身也都被同化并与这个社会连为一体,从而丧失了人作为人的能动性。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充裕的条件,政治统治也以更加沉稳的和具有强大理论支撑的压榨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这同时也固化了人类的本能,从而致使人的想象力极大地萎缩。这种可悲状况的诞生并没有证明启蒙的失败,反而

证明了启蒙的成功。启蒙的极致就是让人沦为受科技理性统治的工具,并与资本主义社会一起来控制自己,这并不是进步本身的失败,反而恰恰是进步之成功的明证,因为在这势不可挡之进步的同时就是势不可挡之退化的来临。

(二) 马尔库塞对工业社会本质的揭露与批判,拓展了认知风险社会的新视域

马尔库塞也看到了随着科技理性的迅速发展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威胁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毁灭性武器的蔓延、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中严重破坏人的生存发展的因素和制度系统的形成。他对此也阐发了独具特色的观点。

一方面,揭露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就在于它通过对外在自然的侵略所获得的在经济和财政上的长足发展,进而由此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摧残。他明确指出,“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必须永远进攻、控制和开发外部自然。”^[2]⁷⁸“获得成功和发财致富要求他们具有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再生产出来。在上述这些状况中,‘正常’的功能都可能导致对人的本质的歪曲和摧残——尽管对人的本质的特性所能下的定义已经相当狭窄。”^[3]关键是对人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害更为深重,它把人沦为麻木的、没有批判意识和反抗活动的木偶,科技理性大规模地扫除最后挑战合理性的障碍,这就导致理性的麻木不仁,从而丧失了奋起反抗的最后一点勇气。

另一方面,对科技理性的过度自信致使科技异化并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所谓异化,就是指“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4]科学技术原本是满足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的各种需求的基本工具和手段,但是在科技理性发展到当前的历史阶段,已经突破其原本的经济范畴和实用性层面而具备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用,使得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最终也使人失去人之为人的基本内在规定性,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技术合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宝座,所以我们的社会就用技术手段来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这就使得一切反对的力量和主张尽都在技术的支配下变成麻木的支持和拥护了。其实,这个科技异化的过程就是向自然“永远进攻、控制和开发”的过程,从其实质而言,这也正是科技理性向外在自然扩张的过程,自然科学在这个过程中被定量化,从而导致了必须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

实同一切内在的人文价值彻底地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这在现实中就显现为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这也正是风险社会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外在客观条件和理论所指。

(三)哈贝马斯对科技理性的价值反思,突出了风险社会的新形态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中科技的社会力量、科技的政治力量和科技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富有见地的认知和犀利的批判,不仅使我们借用他的“显微镜”精准无误地认识到了现代性中科技的现实性力量,并将其中所蕴藏的风险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从19世纪后期,人类生产技术的科学化日益显著,尤其是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与科学就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而成为不可替代的第一生产力,那么,在国家掌握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政治背景中,科技就必将带有使政治合法化的“政治使命”,哈贝马斯对此明确指出,“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5]⁶

一方面,政治生活的科技化构建了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虚假政治局面。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控制着科技的运用和生产力的发展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国家政治机器与科技力量浑然一体的统治形式。因为在科技的支撑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在其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普遍采取新技术和新的科技理念,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大众化”,与此同时还通过新科技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缩短工人劳动时间,使普通民众都有机会和时间参与到新科技支撑下的民主政治当中,虽然这种参与政治方式是政治力量不在场的“非政治化”的表象,但是透过这虚伪的外衣,仍然依稀可以看到政治统治的新形式和变相地进行政治统治的科技策略。新技术在政治活动中的运用,使民主参加这种形式化的政治活动,实际上使民众远离了真正的政治,只是让他们在参与政治的虚假外壳下满足参与政治的愿望而已。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背景下,技术统治论明智地放弃了暴力控制的方式,转而对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行为加以悄无声息地控制,“这一切都在于要营造一个日常生活‘政治空壳化’的虚假的社会景观。”^[6]

另一方面,科技理性为意识形态合法化辩护。“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一理论主旨在法兰克福学派各个理论家的思想中一以贯之,这一基本思想在哈贝马斯这里得到更加系统而又翔实的论述。政治活动的技术化不仅改变了民众参政的方式,还侵

蚀了他们参政的基本思想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一旦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势必将其本身所拥有的功能毫无保留地释放和发挥,与以往相比较,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反而具有异常明显的非意识形态特征,而且这样的意识形态则使人更难以拒绝和反抗,其所发生的影响亦更加深邃和难以根治,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彻底地摧毁了人本身具有革命性的自我意识和自觉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也充分彰显了其所具有的对意识形态的操纵功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维护功能和对民众思想意识及人性的压抑功能。

二、文化工业与主体意识交互中人的发展的价值维度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想基于风险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对主体思想的严重侵蚀和发展条件的制约,并通过对这些状况的批判来揭示文化工业对主体意识的颠覆,从而彰显出高度人文关怀的价值观。

(一)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唤醒沉睡的主体意识

启蒙,原本是为了推翻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和一切摧残人性、违背人道主义的精神统治,但是它在充分发扬文艺复兴文化之后亦然陷入“文化工业”的包围之中,顶替了其所取代的神话所发挥的现实欺骗作用,并将其欺骗人民和麻痹无产阶级斗志的弊端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7]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神话中的思想范畴在由其所推论出来的理性之光中继续得以新生,这些曾经被人们斥之为野蛮的状态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了发展壮大。

一方面,文化工业化是资本主义现代科技遏制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烙印,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每一种文化形式都通过工厂变成为具体的物质形态的商品,即使是相去甚远非物质文化亦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沦为资本增值逻辑链上的环节。这种涵盖了宏观和微观的统一性说明了一种文化新模式的诞生,那就是存在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而在这种新的文化垄断下所衍生

出来的所有群众文化在实质上也就随之都是一致的,而且这一点将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群众文化的一致性直接造成了人的单调性或者单一性,从而也就将人身上本应当具有的革命性、批判性等认识社会、分析社会和批判社会的主观能动性洗刷一空,只剩下一具随着资本逻辑而不停运转的躯壳。此外,人们总是乐意把文化工业理解成为工艺学,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最显著的社会作用就是在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一个标准统一的文化产品,从而就从文化层面顺利地将人打造成为标准统一的人。

另一方面,文化工业的欺骗性和虚假性是麻痹主体意识的基本工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工业化最大的历史性“功劳”就是从工业的维度阐释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中的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从文化的层面诠释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这种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法性,但是这样的合理性却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基本主旨几乎完全本末倒置、甚至抛弃,注重人和关怀人性的宏旨在文化工业的侵蚀下业已沦为“阶下囚”。在文化工业化的时代中,人则成为工业化生产的产物,人已经成为资本逻辑大机器上的具有具体形态和模式的构件。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归宿,即就是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重新打造成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样子。文化工业不仅在其运转的过程中能够塑造人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白,而且还能够通过改造人的生活方式和改变人们对享乐的期望值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合法性,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在本质上仅仅是让人们在精神上通过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粮食满足文化上的需求而已,它虽然向消费者不断地承诺许愿,虽然最大地释放其能量来改变生活形式,但是没有改变它的欺骗行径。

(二) 马尔库塞对主体意识的理论分析, 阐明意识形态变迁的症结

意识形态的变迁是工业社会攻击性与科技异化的衍生品, 自然环境的恶化对人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威胁, 为人的发展横生出了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和制约。这些问题人们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来加以治理和改善, 但其恶果一旦蔓延至意识形态领域和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判断之中后, 所形成的巨大破坏性影响则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良。

一方面, 虚假意识的形成和消费主义的泛滥是意识形态恶性衍生品的直接印证。马尔库塞认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由于文化工业化的风靡, 这就对民众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填鸭式灌输, 使得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反思和批判的意识日渐消沉, 但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这是因为当代工业文明已经证明其不能再用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自由来恰当地定义和描述自由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以自由民主为主题的历史阶段, 经济自由就意味着摆脱经济力量和关系的控制而获得经济自主, 从而摆脱为生存与拼命奔波的状况, 政治自由就意味着个人与其根本无力控制的政治斗争的暂时脱离, 思想自由也就意味着个人获得了工业文明推动下被统治舆论所同化的个人思想。这样的思想一统化和标准化就会形成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因为它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机器中生产出来, 虚假意识的产生酝酿出虚假需求和虚假消费的大行其道和长盛不衰, 所谓“‘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 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5]6} 也就是说, 虚假需求就是资本逻辑运转的机构中把消费者培养成在不幸中享受“幸福”的人, 在消费中满足由社会培养出来的需求, 其中最为流行的需求就是按照传媒的宣传来进行个人的放松、娱乐和消费, 甚至个人的爱或恨都是按照资本逻辑的模板而被复制出来。

另一方面, 风险社会是意识形态变迁与审美判断变革的主要结果。风险社会形成的客观原因就是科技理性催生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及人自身生存的危机纷至沓来的危机局面, 这就为人们从风险的视角重新认知、分析和反省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这反映在主体的主观意识层面上就是要脱离传统和现有意识形态的藩篱和束缚, 并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以正确认识这诸多方面威胁人的发展的风险和充满风险的整个人类社会, 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从只注重生产效率、科技进步的理性至上向重视社会风险、重视风险治理与人的生存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 透过意识形态的变迁还要能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从审美判断的深层次上的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 审美判断上的转变则是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主体性内在动因。“马尔库塞美学理论的最终目的和根本意图, 是通过以艺术为中心的审美革命消除异化, 实现人的解放。”^[8] 也就是说, 在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审美理论以批判现实为主旨, 就是为了批判社会中虚假的合理性和打破主体所沉迷其中的虚假意识, 以直击人们的内心世界, 而这也恰恰是马

尔库塞审美思想的基本主旨,他认为,“这个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由每个个体的‘内心’着手而得以实现。”^{[9]18}就是说从人的心灵着手,构建全新的审美意识实现审美变革是科学认知和重新审视社会的主观意识准备,但就艺术本身而言是具有革命性的,它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来认识世界、描述世界和批判世界,“艺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对现存生活的有意否定,包括否定它的全部体制,它的整个物质和精神文化,它的一切非道德的德性,它的强求和放纵的行为,它的劳作和嬉戏。”^[10]马尔库塞的这种审美观是对科技理性的统治从审美层面上的一种颠覆,是对虚假意识和消费观念的一种深刻批判,是针砭时弊的思想武器,也是从审美视角为风险社会思想理论开辟道路的一种理性尝试。

三、人的发展困境与解放的价值追寻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想不仅包含着对处于世界历史背景下的科技理性的反思批判,而且也注重社会对人的影响,而这则为风险社会中人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向度。

(一) 霍克海默反思人的发展,张扬人的独立性

霍克海默在指明在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的科技理性的日益膨胀对人的生存发展形成挑战,尤其关注文化工业化对人的欺骗所造成的人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沦丧,他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其关于人的发展基本思想和理论主张。他认为真正的真理就是正视人性的知识、严正批判毁灭人性的理论,真正关注价值的知识并不刻意关注其所处领域的高与低,而只是力求以戳穿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虚伪形式为其宏旨,从而便于识别出被摧残和毁灭了的人性的特征。

一方面,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面临着实质性窘境。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要取得发展则必须囿于社会经济环境的约束,还必须服从具体的经济权威,只有这样,人的发展才能在资本逻辑理性运转之中够谋一席之地。“让主体最大可能地适应具体化了的经济权威,便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采用的形式。”^{[11]80}其实,人的发展在任何政治氛围中都要受到客观经济状况和个人自身条件的制约,而且人的发展与社会本质的体现就在这二者的相互交融之中生发出来,离开任何一方都会得到失之偏颇的结果,“人的性格的发展,既受经济境况的制约,又受当事人个人能力的制约。而这些成分总是不断互相决定,以致在整个发展中,它们中的哪一个,在不给对方以作用时,都不可能作为一个能

发挥作用的因素表现出来。”^{[11]22}

另一方面,人的审美过程是对客观过程的主观反映,而真正文明的人的发展则以自身的独立及反省为基础。人的发展是按照自身的审美取向为参照、以客观现实为其基本依据的,那么,在科技理性和资本逻辑充斥整个客观社会的时候,主体按照审美的主观意向来谋求生存发展,也就是符合科技理性和资本逻辑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它们进行的辩解和维护,“纯粹的美感是主体的个人反映,它是个体从流行的社会标准中提取出来的一种判断。”^{[11]26}但这与霍克海默戳穿“虚伪形式”的理论宗旨相悖,人的生存发展应当是绝对自由和完全独立的,必须依靠自身的意愿和选择,而且人也有权力打破这种机制以争取自身的基本权益。“文明大众的特征即绝对自由和思想的独立性。它的观点是由这种信念构成:不屈从任何权威,在所有事物上依赖自己的反省思考,并同时毫无保留地拒斥任何与此不相符合的东西。”^{[11]72}然而这样的自由却被文化工业所禁锢。

(二) 马尔库塞反思人的发展,探讨人的解放的致思向路

马尔库塞阐明科技理性对人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说明人在当前社会中的单向度发展状态,人在虚假意识充斥思想和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背景下主体批判性、革命性和反思性的沦丧。这些实际上是对人的“爱欲”的压抑,这才导致了异化现象的出现和人的单向度发展。他在此基础上还从人的“爱欲”层面上更进一步地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为人的解放探索最根本的理论指导和现实途径。

一方面,“爱欲”的解放是人得到解放的必要前提和突破口。工业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人的爱欲的压抑,这就是爱欲的潜抑状态,这是人的本真状态。即使在虚假意识的支配下通过消费使人的欲望得到很大的满足,其实这只是本真痛苦状态中虚假的愉悦和满足,那么,要使人摆脱这种潜抑从而达到自由发展,这就要实现爱欲的普遍化。在工业时代,通过对“爱欲”的压抑才能有助于创造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然而随着生产力和工业文明的进步,基本的潜抑就显得多余,变成“额外潜抑”,人们都沦为资本逻辑运转大机器上的组成部分,并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分工和社会需要。于是创造出来的虚假意识在真正意识外衣下的阴谋才能够得逞,消费主义才能够以自由为借口而大行其道。“文明陷入人破坏性的辩证法之中,因为对爱欲的持久约束最终将削弱生命本能,从而强化并释放那些要求对它们

进行约束的力量,即破坏力量。”^{[2]28}这些虚假的需要在本质上就是这种约束和破坏生命本能之破坏力量的释放。但是,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要将压抑的人解放出来是违背统治的根本利益的,这就必将陷入解放与反解放的对立冲突之中,因为要把个体从曾为缺乏和不成熟所辩护的各种压制中解放出来的现实性越大,那么继续维持这些方面的压制并使之合理化和不断强化的统治也就越强,并为了避免现存的统治秩序被瓦解的统治意愿也就越来越强了。

另一方面,马尔库塞从审美的视角出发,对人的解放充满积极向上的昂扬斗志和信心。他认为只有依靠解放的意识,就能使科技造福人类,使人的境界得到提高与升华,从而使人得到自由发展。因为只有解放的意识才能够高扬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科技在保护生命和造福生命的时候还能发现并实现人和事物的潜在价值,从而去实现这些价值和其所具有的可能性。技术从而也就会成为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还会反过来塑造现实,那么,这种艺术与科学思维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对立将会消除。于是,“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就诞生了,在这个原则下,一种崭新的感性将同一种反升华的科学理智,在以‘美的尺度’造物中结合在一起。”^{[9]107}

(三)哈贝马斯反思人的发展,揭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选择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领域之间的壁垒日益加深和固化,这就导致了各部门内部专家话语的霸权和各部门之间抑或不同理论话语之间不可消解的话语对抗和难以通约的意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点,认为不同部门可以通过交往、沟通和对话从而实现互相理解以达成共识,他强调“交往理性使得我们有可能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角度,透视社会发展,并把不同的透视面联系起来,通过文化对话寻找结合点。”^{[12]218}一旦找到了这个“结合点”就能够消解对抗实现通约,就能够“通过平等的文化对话使各种文明融合成一个既存在丰富的内部差异性又是统一和谐的有机整体。”^{[12]223}当然,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包含达成共识的基本条件和理论路径,还有着独特的审美内涵。

一方面,交往行为理论是破解生活世界殖民化难题并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文化环境的基本途径。科技的高度膨胀对人类生活和社会造成的深度侵蚀和破坏的现实情状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术语来加以概括。他把现代社会分为两大领域,一个是生活世界,另外一个就是“系

统”;生活世界由家庭生活、个人活动、社会教育、大众传媒等部门所构成,其中积蓄着人们对生活的基本信念,它由人的价值理性所主宰;“系统”则是由社会经济实体、科技力量、管理组织这样的部门所构成,由现代社会中盛行的工具理性所主宰。那么,现代社会危机形成的内在原因就是“系统”在工具理性的宰执下对生活世界深入侵略,并使其在“系统”的逻辑运转中顺从“系统”,从而打破生活世界的原有状态,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正建立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之中。交往行为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对话,而且这样的对话是真实的、正确的,能够表达出对话主体意识的真诚性,这是一种兼具真实、正确和真诚之有效性的理性,只有符合这样的基本条件,交往行为才能够实现,并打破各个主体之间的壁垒和歧义从而走向和解并达成一致。主体间的这种沟通就像艺术活动中的模仿一样,能够打破工具理性与以艺术为代表的价值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表明如果把他者当做榜样是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失而只会带来收获,因为在本质上“模仿能力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抽象的认知——工具关系,因此,它正好构成了理性的对立面,构成了冲动。”^[13]只有这样的交往才能够达到交互主体的理想状态,从而实现生活世界遭受工具理性侵袭和腐蚀的风险。

另一方面,审美的乌托邦情结与主体间性的审美维度,从理论上为人的发展开创新的理念和途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审美思想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就是通过对理性的进一步启蒙来拯救现代性的危机。这一拯救方案除交往行为理论之外,就是从审美层面对现代性的危机进行高度把握,从而为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风险进行诊治提供理论指导,实际上这种审美思想就是交往行为理论的进一步延伸。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思想普遍地透漏出了一种乌托邦情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仍然没有掌握社会变革的未来资源:从一个‘全面受到主导的世界’当然产生不了美好的东西。并且在这种诊断无能的结果中,关于必然解放的预言被涂上了某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的色彩。”^[14]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艺术在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要求它必须通过交往来寻找自己的存在理由。只有在交往行为中,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现代艺术才能不断展现出自身的文化能量。”^{[15]277}也就是说,他的审美思想是寓于交往行为理论之中,二者紧密结合,而且交往行为理论中通过对话和商谈所达成的一致其实就是艺术之有效性的充分展开,艺术作品能够使我们观察

可能熟悉的事物,从而重新揭示出与这些事物相对应的客观现实,这种现象代表着一种只能在错综复杂的生活经验中释放出来的具有真理性的可能。

当然,哈贝马斯欲通过交往使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达成一致,然而就现实中各个有理性的人之间所进行的交往和对话而言,其目的却恰是为了表达他们之间的不同和差异,甚至是相左的观点对立;他欲使对话的真实、正确并将主体的真诚能够确切地表达出来成为达成最终一致的基本条件,但是现实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各自对话的真实、正确及其诚意变得苍白无力。那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只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又一个乌托邦而已,决不能达到使理性恢复统一的目的。”^[16]他欲从审美的视角通过艺术的创造力和冲击力来为交往行为理论进行辩护并对工具理性进行审美层次上的批判,但是艺术在现实中所处的困境是其自身的学理功用大打折扣,它的现代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并不能顺利地展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其始终要受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侵蚀和涤荡,“这是艺术在一个工具理性掌控的世界里所面临的基本困境。”^{[15]280}

马克思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根据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增殖的本质,探索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利润的驱使下日益加剧的客观风险境况,深入分析了人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所遭受的异化困境,科学地提出了实践人道主义是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道路。^[17]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不难发现无论社会发展的阶段还是人的发展阶段,都与风险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强烈的内在一致性,^[18]这就为丰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关于风险社会与人的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和思想准备。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所处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不仅在继承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物化理论和总体性理论,并将之贯穿于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认知之中,从而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展开了透彻地反思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普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所以对科技理性给自然、社会和人影响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在对科技理性和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同时还对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进行了具有创造社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重要思想和批判理论为我们科学认识风险社会与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启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仍然要面临诸多的风险,尤其是我国社会在经历了跨越式发展之

后进入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阶段,这对我国当前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要对这些繁冗的风险进行科学的认知和治理以实现人的科学发展,就应当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关于风险社会与人的发展的思想理论。

参考文献:

- [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
-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3]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00.
- [4]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8.
-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68-69.
- [6]吴苑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的逻辑指向[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4):101.
- [7]谭培文,高学文.从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看文化批判功能[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3):29.
- [8]唐勇.构筑审美乌托邦的根本途径——论马尔库塞的“想象”[J].现代哲学,2008(3):43.
- [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M].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65.
- [11][德]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12]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73.
- [14][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3.
- [15]李健.审美话语及其有效性[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1).
- [16]张汝伦.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6):10.
- [17]雷云飞,杨亮才.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观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
- [18]杨亮才,雷云飞.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7-8.

[责任编辑 冯志宏]

(下转第20页)

[3] 舒心心,穆艳杰.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J]. 社会科学战线,2014(7):1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2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冯志宏]

A Study on Transmutation of Young Marx's Justice Thought

HE Xiao-yong

(School of Marxism Education&Research,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3, Shaanxi)

Abstract: The main works of young Marx contain abundant resources of justice thought.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young Marx's justice thoughts experienced a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the concern of virtue justice of self - improve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subject freedom for social justice, to the focu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law, rational state and justice, the historical justice criticism of modern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 labor justice and its realization. The evolution course and basic ideas of young Marx's justice thought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pondering and solving the immensely complex problem of justi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young Marx; virtue justice; freedom and justice; legal justice; institutional justice; labor justice



(上接第 15 页)

The Value Critique of Risk Society by Frankfurt School

LEI Yun-fei

(College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Shaanxi)

Abstract: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risk society by Frankfurt school provide a value dimension to thoroughly perceive risk society. Through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Frankfurt school reveals the hypocritical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of capitalism, thus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the awakening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points out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n the new era, while focusing on Marx's critical thinking and human values, the basic idea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should also be concerned,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a scientific recognition and management of risks exis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o realize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risk socie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